

引言

黎志添

《道教圖像、考古與儀式：宋代道教的演變與特色》一書，是由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辦的「宋代道教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2011年9月22–23日）的基礎上集結而成的。當時，來自中國大陸、香港、日本、法國、美國的13位學者出席了是次研討會，在短短的兩日內，與會者以宋代道教為中心，從儀式文本、圖像學、物質文化、墓葬、符籙的考古發現、內丹、宮觀管理、民間信仰等不同角度為切入點，深入探討了宋代道教的方方面面。

現存的明《正統道藏》中保存了約一千五百種不同的文本，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在宋元時期（960–1368）產生的。宋代是一個被歷史學家所認可的具有轉折意義的時代，無論是日本學者內藤湖南提出的「唐宋變革」，還是西方學者郝若貝（R. Hartwell）所強調的「小國家、大地方」的格局，宋史研究一直是中國史研究中的重鎮，並且仍在不斷開拓著新的視角，發掘新的材料。身處這一變革時期的道教也在發生變化，著名道教學者司馬虛（M. Strickmann）稱宋代為道教的「復興時代」。宋代帝王支持宮觀營建，制訂國家齋醮儀式規範，組織搜訪修訂道經，自詡為「道君皇帝」的宋徽宗倡導的「神霄運動」更是將宋帝崇道推向了頂峰。同時，我們也不能忽略宋代道教所具有的地方性格，興起於各地的「儀式運動」（ritual movement）重塑了唐代的道教系統，吸納了更多的儀式和地方神祇，與地方社會的民

眾生活變得更為密切。遊走於地方社會的法師則利用各種道教法術，為民眾提供驅邪、考召、治病的宗教服務。宋代湧現出了大量法派，如童初大法、天心正法、靈寶大法、玉堂大法、神霄法和清微法等等，它們的儀式、法術逐漸文本化，使得十二至十三世紀成為了道教儀禮傳統創作的又一個高峰時期。而作為傳統權威的龍虎山張天師一系，在與各種法術傳統互動的過程中，逐漸成為了新信仰和新儀式運動所一致認可的權威中心。

與宋代道教的蓬勃發展相比，宋代道教的研究成果卻是頗為不相稱的，因此，我們召集了道教研究歷史上的首次以宋代道教為主題的研討會，本書也是首本以宋代道教為研究中心的論文集。由於種種原因，雖然有些會議論文並未收入於冊，難免有遺珠之憾；但本書所收錄的九篇論文涉及了道教圖像文化、道教考古、道教法派和儀式、道教與民間信仰、道教內丹及道教宮觀等重要的研究領域，亦可稱得上是碩果累累。

黃士珊教授在其論文〈道教物質文化初探：從《道藏》所藏圖像談宋代道教儀式用品〉一文中，博採宋元科儀書中對儀式用具，包括節、旛、幢、旌、鏡、書刀等和文書的描寫及圖像，並對其源流加以考證，試圖還原出一個真實的宋代道壇。黃教授指出，「為道教神聖經驗所創作的實用手工藝品和空間，對於研究「物質宗教」(material religion) 提供了新的材料和切入點，而這是一個源於物質文化研究的相對嶄新的領域」，「道教的物質性使得它得以在一個多維的宗教環境中顯現，不僅包括具體物件，也包括神聖空間」，並且在這裏，「物質的短暫性和宗教有效性之間有著不可忽略的聯繫：木質、紙質文書和紙錢的易燃(因此轉變為非物質性)標誌著它們輕鬆的他界之旅」。

我們從經典中讀知的道教種種是否真的存在過呢？「道教考古」的成果就能夠幫助我們確認這個事實。張勛燎教授的〈四川、重慶發現的明清「太上生天寶籙」遺跡考〉一文，結合了考古材料和道經資

料，列舉了十餘種「生天寶籙」的不同表現形態。他還強調：「煉度科儀在道教八世紀以來受佛教密宗影響的積聚情況下，在北宋末年和南宋時期急劇發展，生天寶籙作為煉度科儀一種主要的符籙材料，既是煉度科儀大發展的產物，它的廣泛行用，又反過來大大豐富了煉度科儀的內容，推動了煉度科儀的發展。」

白彬教授的論文〈山西地區金元道士墓研究〉，整理了位於山西中部和北部的1156–1275年間的金代、蒙古時期和元初的六座道士墓材料，並將之與同時期北方地區俗人墓、同時期南方地區道士墓作比較，認為它們與前者存在不少共性，後者則相反。北方和南方流行的道教，在喪葬觀念上存在很大不同。雖然兩者的墓內裝飾、隨葬品，都是以表現墓主的家居或內宅生活為主。北方地區墓葬的宗教氣氛比較淡薄，缺乏南方地區，尤其是成都地區表現升仙，或者保衛死者靈魂不受邪魔精怪干擾、復生成仙的內容。

李麗涼教授的論文〈北宋神霄運動的內涵：神學、經典與儀式面向的考察〉，試圖通過道教文獻及宋人筆記，從另一個角度審視這場聲勢浩大的神霄運動，以補充史書中負面而又刻板的記載。她從「神霄」、「火鈴」等神學要素出發，指出了神霄運動在神學思想上對上清派的繼承；又仔細比對61卷本《度人經》、《高上神霄宗師受經式》、《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符圖》、《高上神霄玉清真王紫書大法》等與神霄運動有關的文本，展現出各個經典之間的相關性；最後，她又從各種資料中爬梳出神霄授籙、神霄符印、神霄鍊度的相關記載，展示了神霄運動的儀式面向及其對後世經法的影響。

宋代的道教儀式運動，無論是道教黃籙齋，或是各種道法傳統，向來是宋代道教研究的重點之一。黎志添教授的論文〈南宋黃籙齋研究：以金允中「靈寶大法」為例〉，利用《太上黃籙齋儀》、《上清靈寶大法》、《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等多部唐宋黃籙齋儀式經典，仔細梳理了承自五代杜光庭，延續至南宋的黃籙齋的儀式結構及其特點。他指出，「南宋道教黃籙齋的發展，即是對早已由唐代杜光庭擬

定的已廣泛流行的自然朝儀式的補充。宋代時，考召驅邪儀式、雷法和鍊度，成為了古典黃籙齋儀中的一部分」。在此基礎上，該文的最終目的是為了「將宋代黃籙齋看作是在道教儀式傳統連續體之中產生的發展」，它仍是「建基於他界官僚主義模式之上，這是道教獨特的具有象徵意義的宇宙觀、身體變化觀，以及生理、群體、精神層面的和諧關係」。

鍊度儀是宋代黃籙齋中新添入的儀節，集中體現了道教對於死亡的態度與處理方式。祝逸雯博士的論文〈聚炁回靈，九轉生神：蔣叔輿《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中的鍊度儀〉，在展示宋代鍊度儀式文獻中所記載的儀式基本程序的同時，著重研究其中的符命，試圖揭示其與中古道教之間的鏈接。她指出，除了當代學者普遍強調的水火鍊之外，宋元鍊度還包含了承自中古靈寶修煉之法的「五芽鍊」，融合了靈寶九天、上清九天、神霄九霄等三個系統的「九天生神鍊」，可能出自神霄運動的「混元化形鍊」等等。此外，通過與靈寶鍊度儀式符命的比較，《立成儀》對鍊度符命的揀選體現了自己的特色。

松本浩一教授的論文〈宋代的道教與民間信仰：以祠廟信仰、喪葬儀禮、道教咒術為主〉則從宏觀的角度，為大家展示了以祠廟信仰、喪葬儀禮、道教咒術為焦點的宋代道教與民間信仰的動向。松本教授的研究不但囊括了儒釋道三教，也涉及到了國家與地方的不同層面。他在最後指出了在道教與民間信仰領域觀察到的宋代宗教的幾個特色：第一，宋代以前的民間信仰和宗教行為很少引起知識分子的關心，但是在宋代的史料中常常看到對於這些行為的記述和批判；第二，宋代道教與民間信仰的多種動向同全國性統一神譜的確立有關；第三，中國的宗教儀禮中，常常存在根據不同原理而來的各類因素和表現矛盾想法的因素互相並存的狀態。

橫手裕教授的論文〈宋元道教的內丹養生法〉展示了宋代道教的特點之一：「內在化」(internalization)，該文描述了唐代前的諸道術向內丹發展的過程，宋初以後的外丹法和內丹法及當時出現的《鍾

呂傳道集》、《靈寶畢法》等重要著作，南宋張伯端《悟真篇》的出世及其南宗一系的傳承，包括陳楠、白玉蟾等人，以內丹術為核心教義的全真教的初期教義及其在元代綜合南北兩大道統說而產生的變化，以元末以降的發展作為結語，橫手教授試圖提醒人們內丹說傳承過程之複雜性。此外，宋元時代的內丹法向一般文人的普及，與雷法的兼修，與祭鍊法的融合等方面也是論文關注的焦點。

內修是宋元道教的特色之一，但我們也無法忽略道教的外在載體——道觀的發展，因為對於道觀的研究，正是透視道教教團與地方社會密切關係的途徑之一。酒井規史博士的論文〈宋元時期甲乙住持之道觀：以洞霄宮為中心〉，正是對宋代道觀經營方式的研究。他利用《洞霄圖志》中記載的歷代住持名單和傳記資料，指出洞霄宮是一座同門師徒繼承道觀管理權的「甲乙住持」宮觀，且爬梳了此項制度實施的具體細則。酒井博士還利用碑文資料，展現了進入南宋後，洞霄宮出身的道士們於遠近創建新道觀，並以這些新道觀為基礎，形成新分派，由此擴展了洞霄宮勢力的過程。而這些新道觀又各自採用了甲乙住持的制度，從而更加強了法統的認識。論文最後以中國北方的甲乙住持道觀：易州龍興觀為例，一窺元代道觀經營的整體情況。

道教研究是對一種宗教的研究，有其特殊性，但同時它也是開放而多元的，我們可以從物質文化、藝術、考古、文本研究、田野調查、歷史研究等多種途徑，接近道教，本論文集正是這樣一種多面向研究的集合。我們希望能夠藉此拋磚引玉，引起學界對宋代道教更多的關注與討論。最後，編者要特別感謝賀晏然博士和祝逸雯博士在本書集稿、編輯、校訂過程中多所襄助，無限感激。